

体育参与阶层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

许 玮, 朱建勇

(南京邮电大学 体育部,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基于CGSS2005、CGSS2015两期截面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中国居民体育参与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2005-2015年间,居民体育参与率显著提高,体育参与的群体异质性与阶层分化现象日益凸显;(2)传统社会分层变量对体育参与的影响呈现多样化特征:随着时间推移,个人受教育程度对体育参与的促进作用递增,职业分层的影响依旧显著,而收入对体育的促进作用不断减弱;(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力在不断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家庭教育资本的作用不断增强。因此,要关注体育参与与群体异质性扩大化倾向。建议通过优化政策,降低结构性因素导致的体育参与不均衡问题,提高弱势群体的体育参与率。

【关键词】体育参与;体育锻炼;家庭体育;大众体育;体育社会阶层

【中图分类号】G8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656(2020)01-0077-10

DOI:10.15877/j.cnki.nsic.20200305.001

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体育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据《中国群众体育发展报告(2015)》的统计数据,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已上升为33.9%,比2007年的调查数据高出5.7个百分点。近年来,随着《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和《“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相关政策实施,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和比例进一步增长。以往研究都是从总体的体育参与来评价群众体育发展,较少关注体育参与异质性和阶层化现象,更鲜有讨论体育参与的分层演化机制问题,从而难以全面地评估社会发展和相关公共政策因素对不同社会阶层中的个人体育参与产生的影响。为此,本文拟利用2005年和2015年两期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聚焦我国居民体育参与与差异的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旨在回答:(1)我国总体上的体育参与率提高是否会导致体育参与的阶层差异缩小?(2)随时间推移,传统意义上影响体育社会分层要素的作用效果是否发生变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转型时期大众体育参与阶层化现状、发展趋势及其作用机制,为群众体育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1 文献评述与研究框架

大众体育参与的阶层差异几乎遍及全球各个国

家和地区^[1-6],多数研究援引社会分层相关理论去诠释体育参与中的不平等发生机制,并在一些观点上达成了广泛共识。本文借鉴社会分层理论中“先赋—自致”两分法,将影响体育参与不平等的因素分别划分到“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两大类别之中^[6],以评估我国居民体育参与的阶层差异。“先赋”因素是指与生俱来,且后天无法改变的特征,例如性别、种族等。“自致”因素是指通过后天努力可以改变的特征,例如教育、收入、职业等。根据“先赋”和“自致”因素各自对社会分层的作用大小,可以评价社会封闭与开放程度。一般而言,当社会分层完全由先赋因素确定时,即不管个人如何努力,都不能冲破阶层壁垒,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那么这种类型的社会被称为“封闭型社会”。反之,当社会分层完全由自致因素决定,即通过个人后天努力,即可实现向上阶层流动,该社会类型被称为“开放型社会”。在现实中,极端社会类型比

收稿日期:2019-12-29

基金项目:2018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一般项目:城镇居民体育锻炼行为的阶层差异及其演化机制研究——以江苏省为例(2018SJA0089)。

作者简介:许 玮(1984-),女,安徽砀山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体育社会学。

通信作者:朱建勇(1971-),男,江苏盐城人,硕士,教授,研究方向:体育社会学。

较罕见,多数社会是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共同决定社会分层。自致因素占的比重越高,相应的社会开放度也越高。

1.1 “先赋”因素与体育参与机会

在众多因素中,性别和种族是最易于识别的先赋因素,也几乎是所有不平等研究必然涉及的因素。在体育参与研究中也不例外。一些研究考察了体育参与中的性别差异,发现女性体育参与机会显著低于男性^[7-9]。一方面生理性因素决定了女性在运动参与方面存在天然劣势;另一方面也与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角色定位不同有关^[10]。不过,体育参与的性别差异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Van T. Charlotte及其合作者对欧洲25国居民的定期体育参与进行定量分析发现,比利时、法国、希腊等12个国家男性有更高的体育参与率,而丹麦、芬兰、瑞典等13个国家女性参与率更高。一项基于中国的综合调查数据定量分析发现,性别对体育参与的影响只是在结婚成家和子女抚育阶段有显著差异,而其他年龄段并不显著。由此可见,体育参与的性别差异可能还取决于被研究对象所处的年龄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不同的文化场域等。在族群影响方面,多数研究指出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的体育参与率相对较低^[11-12]。但也有一些研究发现,体育参与并无种族差异^[13]。由于我国历来重视民族融合,并在民生领域给予少数民族更多的政策支持,因而,我国体育参与的族群差异可能远低于西方国家。

年龄的影响。一项针对体育参与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体育参与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该研究在综合动物实验基础上发现,体育参与随年龄而下降是多巴胺系统调节机制影响了体育参与动机的结果^[14]。而另一项研究发现,体育参与率随年龄增长呈反“J”形变化,即在15~18岁年龄段体育参与率快速下降趋势,18~29岁年龄段体育参与率缓慢下降,而30~64岁阶段体育参与率趋于平稳。体育参与的反“J”形年龄模式在西方发达国家被普遍证实^[15]。与西方学者的发现不同,国内多数研究者认同体育参与的年龄模式是一个相对稳定的“U”形结构,即体育参与随年龄增长,经历了先降后升的变化^[16-18]。不过,也有个别研究认为,体育参与的年龄模式并非固定的“U”形特征,而是呈现出某种线性下降趋势^[19]。

家庭出身的影响。家庭对个体体育参与的影响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为子女提供更好的经济基础、教养方式培养孩子良好的锻炼习惯,另一方面,通过父母与子女互动,培养下一代的体育兴趣与价值观。家庭社会阶层越高,其父母与子女的共同参与体育,形成良性互动的可能性就越高^[20]。中国各社会阶层虽然尚未形成泾渭分明的“品位”偏好,但多数父母还是愿意用个人和家庭资源培养和提升下一代的阶层“品位”,为子代阶层跨越做准备^[21]。从实际来看,父母对子女的投资中就包括了对孩子体育兴趣和锻炼习惯的培养。因而,家庭因素对个体体育行为的影响同样不能忽视。

户籍的影响。国内大量的研究发现,与城市户籍相比,农村户籍在社会流动、生活机会上,面临多重劣势。在体育研究中,集中探讨户籍因素对体育参与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因为无论是体育资源布局,还是居民体育参与热情,中国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异都异常显著^[22]。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推进,城乡之间的体育资源差异在缩小,农村户籍人口的体育参与热情也在提高。那么,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开放度的增加,是否会消解体育参与的户籍壁垒?

1.2 自致因素与体育参与机会

自致因素包括经济收入、职业、教育获得等因素。在体育科研中,大都将这些因素作为外生变量探讨其对体育参与的作用。多数研究发现,经济收入、职业性质以及受教育程度直接地影响到体育参与机会^[23-24]。经济收入越高,个人参与体育活动的可能性也越大。甚至在移民研究中也发现,外族移民之所以在体育参与上落后于本地人,主要是因为外来移民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所致。在职业方面,白领精英阶层的体育参与率普遍高于蓝领和普通体力劳动者,个人体育参与行为的职业分层相当显著^[25-26]。国内研究同样也发现了体育参与在职业上的差异性,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管理者有相对更高的体育参与率,体制内从业者在体育参与上比体制外从业者更有优势。教育对“体育参与”的作用在“教育与健康”的因果关系研究中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阐释。大量的研究发现“体育参与”是“教育对健康影响”的重要中介机制^[27-29]。一方面教育可以促使人养成健康锻炼的习惯,提高健康意识,从而提高个体体育参与率,另一方面教育也是一种可兑换资本,即通过教育资本兑换

“稀缺”的体育资源。概言之,经济、职业和教育既是分层的标准,又是冲破社会分层壁垒的途径。即通过个体的努力,实现阶层跨越。

1.3 研究框架

已有研究大致勾勒出大众体育参与不平等的图景,并对一些重要因素进行了深度探讨,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思路上的启示。但已有研究缺乏

纵向时间维度的分析,难以回答影响体育参与不平等的相关因素是否随时代变迁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以及如何发生变化等问题。虽然少数西方研究对体育参与进行了纵贯分析,但由于文化差异和国情差异,大多数结论是否可推广到中国情境,也需要检证。本文拟运用全国代表性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以对上述问题做出回应,具体分析框架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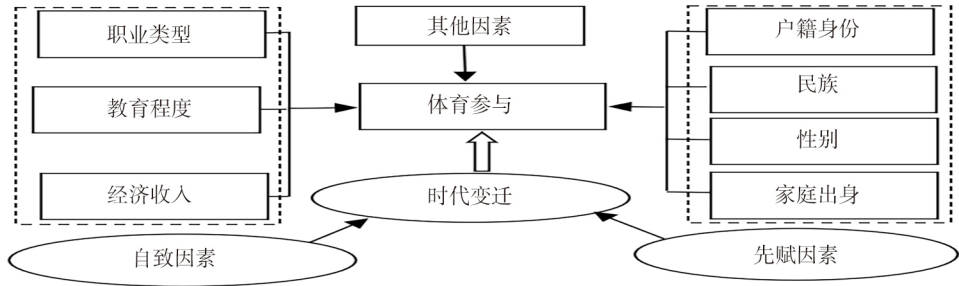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居民体育参与影响因素的分析构架

Fig.1 Analysis framework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ports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residents

2 数据、变量与模型设定

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调查数据库。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始于2003年,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由于具有较高的效度和信度,该数据在 sociology、人口学、政治学等多学科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本文使用的数据是2005年和2015年两个年度的调查数据。两期数据均采用多阶层PPS抽样方式进行抽样,确保数据对全国有较好的代表性。考虑研究需要,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为调查中的城市样本(不同户籍人口在城市时空下可减少城乡资源因素的干扰)。在剔除变量缺失和异常值后,保留了2005年城市样本5 922人,2015年城市样本5 427人,两期混合样本总量为11 349人。

2.2 变量操作化

2.2.1 因变量:体育参与

“体育参与”通过问题“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在空闲时间参加体育锻炼”来测量。1:“每天”;2:“一周数次”;3:“一月数次”;4:“一年数次或更少”;5:“从不”。参考以上的做法将“体育参与”处理成分类变量。“体育参与”是一种行为模式,从日常生活视角来看,体育参与应具有恒常性,偶尔参与体育锻炼可能仅仅代表一种偶发行为。在具体操作化时,我们将

“一月数次”“一周数次”和“每天”参与体育锻炼的行为作为一种“恒常性”体育参与行为,而“一年数次或更少”和“从不”参与体育锻炼的人归为“不参与或较少参与体育锻炼”类别。按照这一分类标准,“体育参与”可操作化为二分类变量,即发生参与体育行为和未发生体育参与行为(参照类)。

2.2.2 自变量:户籍身份、年龄、性别、职业性质、教育程度、年收入对数、家庭出身(14岁时家庭社会阶层、父母的教育程度)等

考虑到以往研究中发现个人健康状况也对体育参与行为产生影响,在模型分析中“健康状况”也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根据户籍性质,将被访者户籍身份划分为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在数据分析中,户籍性质处理为二分变量,以农业户籍为参照。性别处理为二分变量,以女性为参照。年龄、教育、年收入对数、健康、当前个人社会阶层和14岁时的家庭社会阶层均处理为连续变量。教育变量的测量根据“未读小学”(=0)、小学(=6)、初中(=9)、高中(含职高、普高、中专、技校,=12)、大专(=15)、本科(=16)、研究生及以上(=19),数值越大代表受教育程度越高。个人年收入分别根据问卷中2004年和2014年全年总收入来测量,按惯常做法取其对数形式来表述。健康采用常用的“自评健康”指标来测量,按照从“很不健康”到“健康”分别赋值1~5,数值越大,代表健康状况越好。个

人社会阶层测度当前个人社会阶层地位,赋值从1~10分别代表阶层从“最底层”到“最高层”。14岁家庭社会阶层代表个人的成长环境,旨在分析“个人早期成长的家庭环境”是否对个人今后的“体育锻炼行为”

产生影响。从1~10赋值,代表着14岁时家庭社会阶层从“最底层”到“最顶层”的变化,数字越大,社会阶层也越高。表1是混合样本、2005年样本和2015年样本的变量描述结果。

表1 中国居民体育参与影响因素的样本分布特征

Table1 Sampl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ese residents' sports participation

变 量	混合样本	2005年样本	2015年样本
体育参与(否=0,%)	54	30	67
户籍身份(农业=0,%)	71	72	69
性别(女=0,%)	47	47	47
年龄(岁)	46.49(16.36)	44.74(15.48)	48.42(17.06)
健康水平	3.94(1.22)	4.11(1.37)	3.74(0.99)
职业性质(体制外=0,%)	35.1	48.4	41.1
婚姻状况(未婚=0,%)			
在婚(%)	79	81	76
离婚、丧偶(%)	9	7	11
收入对数(ln)	8.69(2.98)	8.60(2.17)	8.81(3.66)
教育年数(年)	11.33(4.58)	10.57(4.66)	12.01(4.35)
14岁家庭阶层(下层=0)			
中下层(%)	32	33	31
中层(%)	43	43	50
中上层(%)	6	5.6	7.1
上层(%)	0.5	0.4	0.6
母亲的教育程度(年)	4.75(3.88)	4.91(3.59)	4.59(4.16)
父亲的教育程度(年)	6.19(4.28)	6.41(4.06)	5.96(4.50)
2015年(2005年=0)	48	—	—
样本量	11 349	5 922	5 427

注:(1)两个调查在“社会阶层变量”的提法不一致,2015年调查是分为10级量表,而2005年则是5级量表,我们按照2005年的5级问项,进行了统一编码;(2)两年的样本数据已进行了加权调整,表中结果为加权调整后的结果。

2.3 模型设定

本文因变量大众体育参与是二分类变量,拟采用二值logistic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logistic模型主要用于对二值变量的相对风险率进行建模。将参与体育设定为1,未参与体育设定为0,那么,体育参与的概率可通过logit变换后,可表达成线性形式,具体模型为:

$$\text{logit}(p_i) = \log \left[\frac{p_i}{1 - p_i} \right] = \sum_{k=0}^k \beta_k x_{ik}$$

其中, x_i 表示影响大众体育参与的解释变量, β 代表一组与解释变量 x_i 对应的回归系数,代表该因素对相对风险率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本文使用了两期截面数据混合样本,有可能产生变量分布不一致和变量估计的异方差问题。我们在模型中添加年份虚拟变量,且用稳健标准误替代一般标准误来修正上述问题。

3 实证分析

3.1 体育参与率变动趋势

图2是大众体育参与率的箱线图。第1个和第2个箱线图分别代表着2005年和2015年的大众体育参与率。其中,2005年的大众体育参与率为0.30,2015年大众体育参与率(0.66)是2005年的2.2倍。按照户籍性质重新分割样本,可以得到不同年份农村和城市样本体育参与率的变动情况。图2中第3、第4个箱线图分别代表2005年和2015年农村户籍人口的体育参与状况,第5、第6个箱线图分别代表2005和2015年城市户籍人口的体育参与状况,其中,农村户籍人口的平均体育参与率从2005年的0.21提高到2015年的0.61,城市户籍人口的平均体育参与率从2005年的0.35提高到2015年的0.69。由此可见,无论是农村人口还是城市人口,在过去10年间体育参与率都有较大水平的跃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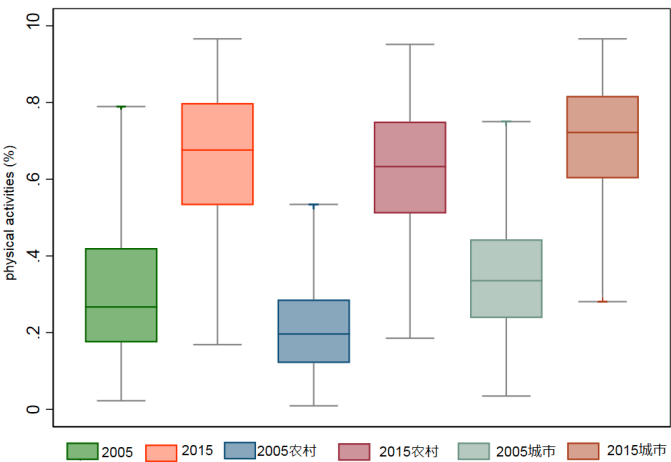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体育参与率变动情况:2005—2015年

Fig.2 Changes in China's sports participation rate between 2005 and 2015

3.2 先赋和自致因素的影响

表2是体育参与的logit模型估计结果。模型1是混合样本,模型2、模型3分别是2005和2015年样本。从估计结果来看,户籍身份、教育程度、收入、社会阶层以及父母亲的教育程度等传统社会分层变量,都显著地影响到体育参与不平等。

首先,大众体育参与存在明显的户籍差异。根据模型1的估计结果,与农村户籍相比,城市户籍人口体育参与发生比平均高出37.7%,这佐证了前文描述性分析结果;在三个模型中我们并未观察到体育参与的性别差异。这一方面因为中国居民参与体育的性别差异不明显,另一方面性别因素的影响可能被其他中介因素所替代。

其次,教育程度、个人收入以及从事体制内工作对体育参与有明显的促进效应。具体而言,个人受教育年数每增加1年,其相应的体育参与发生率平均提高9.4%,收入对数每提高一个单位,相应的体育参与发生率比平均提高4.1%。此外,体制内从业者要比体制外从业者更可能参与体育。体制内从业者体育参与率要比体制外从业者高出23.4%。这一结果与国内外的多项研究基本一致。

其三,家庭社会阶层显著地影响到个体的体育参与。以“下层”为参照,家庭社会阶层为“中下层”“中层”和“中上层”的被访者体育参与发生比分别提高了43.3%、66.5%和69.9%。随着家庭社会阶层的上升,个体的体育参与水平也随之上升。因此,促进社会阶层向上流动,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也对个体的体育参与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不过,近年来研究者们发现中国社会存在明显的阶层固化现

象,且农村社会阶层还有普遍的“向下流动”趋势^[30-31]。这必然会对大众体育参与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其四,父母的教育程度对子代的体育参与也有积极影响。模型1结果显示,父母双亲的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的体育参与率也越高。其中,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年数每增加1年,其相应的体育参与率分别提高3.05%和2.02%,父亲教育对子女的促进作用略高于母亲。不过,从分年度来看,2005年数据显示,父亲教育对子女体育参与的边际效应较大,而2015年的数据却显示母亲教育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这是否暗示着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体育参与的影响力正在逐渐上升,仍需要在交互效应分析中去检验。

此外,个人的健康水平、婚姻状况等也显著地影响到体育参与。个人健康状况越好,其参与体育的可能性也越高。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健康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体育参与的发生率平均提高7.3%。这说明健康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体育参与的前置条件。与未婚者相比,已婚或离婚(含丧偶)者体育参与发生率显著下降。在控制其他因素前提下,已婚和离婚(或丧偶)者的体育参与发生率分别比未婚者平均下降51.3%和61.9%。

比较模型2和模型3可以发现,大多数“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刚性”特征(rigidity),但不同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出现了一定的变化,由此我们推测,除了测量误差和样本量影响外,是否也意味着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这些影响体育参与的主要因素的作用强度也在发生着变化?下文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纳入年份与关键变量的交互项,以检验这种推断。

表2 体育参与的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稳健估计)

Table2 Estimation r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for sports participation (RE)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户籍身份(农业=0)	0.32*** (0.06)	0.47*** (0.13)	0.31*** (0.08)
性别(女=0)	0.06(0.04)	0.04(0.06)	0.12(0.07)
年龄(岁)	0.01*** (0.002)	0.02*** (0.003)	0.01*** (0.002)
健康水平	0.07*** (0.02)	0.04*** (0.02)	0.17*** (0.03)
婚姻状况(未婚=0)			
在婚	-0.72*** (0.08)	-0.97*** (0.10)	-0.42*** (0.13)
离婚、丧偶	-0.97*** (0.11)	-1.18*** (.16)	-0.62*** (0.17)
收入对数(ln)	0.04*** (0.007)	0.08*** (0.02)	0.02** (0.008)
教育程度(年)	0.09*** (0.007)	0.07*** (0.008)	0.12*** (0.01)
职业性质(体制外=0)	0.21*** (0.05)	0.19*** (0.07)	0.17** (0.07)
社会阶层(下层=0)			
中下层	0.36*** (0.06)	0.47*** (0.08)	0.16(0.10)
中层	0.51*** (0.06)	0.70*** (0.08)	0.24** (0.09)
中上层(含上层)	0.53*** (0.10)	0.71*** (0.13)	0.24* (0.16)
母亲教育程度(年)	0.03*** (0.008)	0.02(0.01)	0.04** (0.01)
父亲教育程度(年)	0.02** (0.007)	0.03** (0.009)	0.03(0.01)
2015年(2005年=0)	1.68*** (0.05)	——	——
常数项	-3.22*** (0.17)	-3.49*** (0.26)	-1.85*** (0.26)
R ²	0.150	0.08	0.09
LR·x ² 检验统计量	1828.7	519.1	539.7
N	11349	5922	5427

注:(1)模型1为混合样本、模型2为2005年样本、模型3为2015年样本;(2)显著性水平:“+”代表 $P < 0.1$,“*”代表 $P < 0.05$,“**”代表 $P < 0.01$,“***”代表 $P < 0.001$;(3)表中数字为变量系数估计值,括号中的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3.3 自致、先赋因素与年份的交互效应

表3中模型4至模型10分别在表2的模型1基础上,分别纳入了年龄、户籍身份、教育程度、职业类型、社会阶层、收入、健康、父亲教育以及母亲教育等的交互项。

3.3.1 年龄与年份的交互效应

图3是城市户籍人口和农村户籍人口在体育参与年龄模式的比较。两者的年龄模式差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育参与率的“谷值”和“峰值”大小存在差异。城市户籍人口体育参与率的“谷值”(B)和“峰值”(D)分别高于农村户籍人口(A和C);二是两者达到“峰值”和“谷值”的时间先后存在差异。城市户籍人口体育参与达到“谷值”和“峰值”的时间点明显滞后于农村户籍人口;上述两个因素叠加是年龄平方项未能通过统计检验的主要原因。从图形分析看,中国居

民体育参与的“U”形年龄模式仍然成立。无论城市户籍人口体育参与率还是农村户籍人口的体育参与率,其与年龄变动之间的关系存在明显的“U”形特征。从两个图形的比较中,我们也看到城市户籍人口体育参与的“U”形年龄模式趋于平坦,农村户籍人口体育参与年龄模式“U”形特征更明显。这说明,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城市户籍人口越来越重视体育参与。因此,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体育可能成为每个人的日常活动,届时如果仍按照二分变量刻画体育参与,这种“U”形年龄模式可能不复存在。换言之,随着时代变迁,年龄因素将逐渐弱化,年龄也将不再是影响体育参与行为的最主要因素。模型4的年龄与年份交互项检验佐证了这一推测,年龄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对体育参与的作用在减弱(见表3)。

表3 带交互项的logit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稳健估计)
Table3 Estimation results of logit regression model with interaction term (RE)

变量	模型4	变量	模型5	变量	模型6	变量	模型7
年龄	0.02*** (0.002)	户籍	0.48*** (0.12)	父亲教育	0.01 (0.008)	母亲教育	0.01* (0.007)
年份	2.33*** (0.14)	年份	1.85*** (0.13)	年份	1.59*** (0.08)	年份	1.53*** (0.07)
年龄×年份	-0.02*** (0.003)	户籍×年份	-0.19 (0.13)	父亲教育×年份	0.01 (0.01)	母亲教育×年份	0.03* (0.01)
变量	模型8	变量	模型9	变量	模型10	变量	模型11
家庭阶层	0.26*** (0.08)	教育	0.07*** (0.007)	职业性质	0.26*** (0.07)	收入(ln)	0.08*** (0.02)
年份	2.03*** (0.13)	年份	1.16*** (0.12)	年份	1.74** (0.07)	年份	2.10*** (0.17)
家庭阶层×年份	-0.14** (0.05)	教育×年份	0.05*** (0.001)	职业性质×年份	-0.10 (0.08)	收入(ln)×年份	-0.05** (0.02)

注:(1)显著性水平:“+”代表 $P < 0.1$,“*”代表 $P < 0.05$,“**”代表 $P < 0.01$,“***”代表 $P < 0.001$;(2)表中数字为变量系数估计值,括号中的数字为稳健标准误;(3)限于篇幅,表中其它变量估计值略去;(4)为了方便表格呈现数据,模型8中的家庭社会阶层变量设定为连续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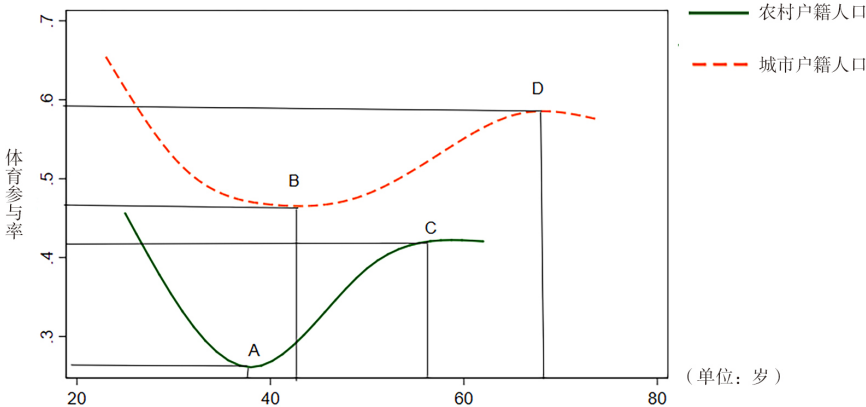


图3 不同户籍人口的体育参与年龄模式差异

Fig.3 Age patterns of sports participation of different household registration population

3.3.2 户籍身份与年份交互效应

表3的模型5是加入“年份与户籍身份”交互项后的模型,年份和户籍身份仍具有独立的正向影响,但交互项并未通过统计检验。说明“户籍身份”因素的影响效应并未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大众体育的户籍区隔效应并没有因为时代变迁而减弱,也表明了户籍身份对大众体育社会分层具有“刚性”作用。换言之,体育参与的户籍差异,不只是城乡体育资源布局上的差异,还有户籍本身的内在影响。

3.3.3 父母教育与年份交互效应

模型6、模型7分别加入了“父亲教育与年份交互项”“母亲教育与年份交互项”。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父亲教育与年份交互项”“母亲教育与年份交互项”的系数均为正,但前者没有统计显著性,而后者通过了统计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从2005年到2015年这10年间,“父亲教育程度”对子女参与体育的促进作用基本没有发生改变,而“母亲教育程度”对子女的体育参与的促进作用呈现出逐年增强之势。这佐证了前文的结论,即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体育参与的影响

力正在进一步提升。这说明,父母亲受教育程度以及由教育而形塑的生活方式对子女的生活方式选择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安妮特·拉鲁的研究指出,有母亲参与的协作式教育培养对子女的学校参与和教育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32]。无独有偶,这一结果也与最近的一项关于父母对子女成长影响的经验性研究结论相吻合,该项研究证实,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性发展更加重要,而父亲对子女的心理发展作用更大^[33]。随着时代变迁和家庭转型,父亲和母亲分别在不同的维度上对孩子行为的塑造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3.3.4 教育、职业、收入与年份交互效应

表3的模型9至模型11分别是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教育、职业、收入三个因素与年份的交互项。其中,教育以及教育与年份交互项均显著为正,说明教育对大众体育参与的促进作用随着时代变迁有增强趋势。控制其他因素后,2005年个体受教育每增加1年,体育参与率平均提高7.25%,而在2015年,这一数字上升至13.88%。这说明个人教育程度的提高对体育参与的促进作用在不断增加。模型10中的“职业性质与年份”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这说明

随着时间推移,从事体制内工作的人参体育参与的优势有减弱趋势,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体制内工作单位的资源优势仍是分割大众体育参与率的重要因素。模型11中的“收入对数与年份”交互项系数为负,且有统计显著性。在2005年,控制其它因素情况下,收入对数变动1个单位,个体体育参与率平均提高8.32%,而2015年这一数字下降到2.02%。与此类似,家庭社会阶层对个人体育参与的作用也有下降趋势。此外,模型8中“家庭阶层与年份”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家庭社会阶层对体育参与的促进作用在不断弱化。但个人收入和社会阶层作用的弱化并不意味着社会阶层或个体收入差距趋向平等化,而是随着公共体育设施的完善和公众健康意识的提高,体育参与逐渐成为大多数人生活中的“必需品”,体育参与的阶层壁垒和经济上的约束必然会降低。同时,在这一转变中,我们也应看到全民健身政策的实施、公共体育资源的投入、体育场馆的优化布局等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极大程度上满足了底层居民免费参与体育的需求。

4 结论与思考

4.1 结论

以往研究主要针对单期截面数据对体育参与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无法准确地描述纵向时间维度下不同因素作用效果及变化趋势。本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05年和2015年两期调查数据,动态地分析了居民体育参与率变动趋势,获得如下发现。

(1)2005—2015年10年间,中国居民体育参与率显著提高。无论是城市户籍人口,还是在城市生活的农村户籍人口,体育参与率都得到了全面提升。但大众体育参与率升高的同时,也存在着体育参与的异质性和阶层分化问题。

(2)城市户籍人口体育参与率显著高于农村人口。户籍身份在体育参与上的“分割性”作用,在10年间并未发生改变。

(3)我国居民体育参与年龄模式上仍有明显的“U”形特征,但城市户籍人口的体育参与U形特征趋向平坦,而农村户籍人口体育参与U形特征更明显。城市户籍人口的体育参与年龄结构在发生改变,曾经体育参与度较低的中间年龄群体体育参与率不断提升。

(4)传统社会分层变量对体育参与依然有较强的影响。具体而言,随着时代变迁,教育的体育促进作用在增强,教育的溢出价值不断显现;体制内从业者在体育参与率上远高于体制外从业者,呈现出明显的职业分割特征;收入和社会阶层提高有助于促进体育参与,但这种作用随时间推移有下降趋势。

(5)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越有可能参与体育活动。从纵向时间维度看,父亲教育的促进作用在10年间未发生变化,而母亲教育的促进作用呈增强趋势。这预示着家庭变迁过程中,父亲和母亲在家庭分工、角色定位已不同于传统家庭,家庭结构完整对于子女的健康行为的养成具有重要作用。

4.2 思考

上述结论表明,中国居民的体育参与已从过去单纯参与体育活动向内涵式体育参与发展。在新的发展阶段,家庭因素对子女体育行为的养成具有重要作用。这与最近一项研究基本一致^[21]。这表明,随着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体育行为也将逐步成为表征社会阶层差异的显性指标,在家庭阶层代际传递或家庭阶层再生产过程中,打上了明显的家庭烙印。今后,随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体育公共资源增长以及公众体育参与意愿的提高,居民体育参与的阶层化特征将向“精细化”方向发展。届时,参与什么类型(项目)的体育、与谁一起参与体育,或将成为新的体育参与分层标准。不过,当前我国居民体育参与,仍处于上升阶段,远未达到“高度参与”程度。因此,总体体育参与率攀升和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分化趋势共存格局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属于常态现象。对此,政府体育职能部门应予以高度重视,力求消解制度因素造成的公共体育参与差异,为减少体育参与不平等提供制度保障。一是正视体育参与的城乡差异,提高乡村居民体育参与率。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大力发展乡村体育,加大乡村体育基本设施投放力度,降低城乡公共体育资源落差;二是引导乡村劳动力人口参与体育活动,改善乡村体育参与的“U”形人口结构。西方发达国家体育参与年龄差异较小,各年龄层的体育参与率几乎就是一条水平直线,并没有因年龄因素而发生较大波动,我国农村体育参与年龄结构依然呈明显的“U”形结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参与度相对较低,可通过政策宣传和组织开展乡村特色体育赛事,引导这一群体参与体育活动,提高农村

居民体育参与率;三是重视各级教育在培养体育参与意识、终身体育价值观方面的作用,通过体育教育改革,提高教育促进体育参与的回报率;四是重视家庭因素对体育参与的促进作用,改善代际体育参与模式。家庭体育模式一直是西方体育发达国家的主要参与模式,例如在美国、欧洲发达国家,家庭成员在节假日共同参与体育几乎成为一种风尚。尤其是亲代与子代共同参与体育活动,不仅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和培养子代良好的心理品质,也有助于培养子代爱好体育运动,为终身体育参与奠定基础。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我们也应重视家庭体育在全民体育参与促进中的价值,让家庭体育成为全民体育参与的又一动力来源。

此外,由于体育参与不仅受到阶层因素和个体特征的影响,同时还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受调查数据所限,本文并未讨论10年间社会环境、文化和政策因素变化带来的影响。这一不足,期待今后数据的进一步完善而得到更深入的分析。

参考文献:

- [1] 任玉梅.性别差异下的平等:女性参与奥运会的诉求探析[J].体育科学,2015,35(8):92-96.
- [2] 窦洪茵,孙淑慧.性别“平等”的诉求与超越: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女性参与[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5,38(10):37-42.
- [3] 周进国.从社会分层的视角看我国社会体育[J].体育学刊,2007(1):138-140.
- [4] 彭大松.不平等视角下体育参与差异的经验研究[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4,38(4):13-19.
- [5] WILCO S, KING A C, CASTRO, et al. Do Changes in Physical Activity Lead to Dietary Changes in Middle and Old Age? [J].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000, 18 (4) : 276-283.
- [6] VAN T CHARLOTTE, SCHEERDER J.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Patterns of Leisure-time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Europeans[J]. Science & Sports, 2010, 25(6):304-311.
- [7] 王智慧.性别差异与女性体育参与的社会距离[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3,47(7):16-21,27.
- [8] 晏妮,黄聚云.上海成年居民休闲体育活动参与情况的性别比较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6(11):76-81.
- [9] DARLISON E. The Global Relevance of Physical Activity in the New Millennium[J]. Achper Healthy Lifestyles Journal, 2000, 23 (4):101-118.
- [10] YONGKYO KIM, KANGBON GOO. Exploration of Inequality Structure of Sports Phenomena [J]. Korean Philosophic Society for Sport and Dance, 2008; 16(4): 109-120.
- [11] SHAW BENJAMIN, A LIANG, KRAUSE NEAL, et al. Age Difference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The Long-Term Trajectories of Leisure-time Physical Activity[J]. Gerontology, 2010, 65 (6):756.
- [12] DERGANCE J M, MOUTON C P, LICHTENSTEIN, et al. Potential Mediators of Ethnic Differences in Physical Activity in Older Mexican Americans and European Americans: Results from the San Antonio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ing [J]. The American Geriatrics Society, 2005, 53(7):1240-1247.
- [13] Jr D S, MOHD NASIR M, ZALILAH M S. Sex and Ethnic Differentials in Physical Activity Levels of Adolescents in Kuantan [J]. Malaysian Journal of Nutrition, 2007, 13(2):109-20.
- [14] SALLIS J F. Age-related Decline in Physical Activity: A Synthesis of Human and Animal Studies [J]. Medicine & Science in Sports & Exercise, 2000, 32(9):1598-1600.
- [15] CASPERSEN C J, PEREIRA M A, CURRAN K M. Changes in physical activity patterns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sex and cross-sectional age [J]. Medicine & Science in Sports & Exercise, 2000, 32(9):1601-1609.
- [16] 彭大松.中国成年人体育锻炼的影响因素[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2,36(5):25-30.
- [17] 李晓天,邢晓燕.社会分层视角下中国城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行为分析——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4,37(9):17-25+32.
- [18] 王富百慧,王梅,张彦峰,等.中国家庭体育锻炼行为特点及代际互动关系研究[J].体育科学,2016,36(11):31-38.
- [19] 邵义峰,周武,赵刚,等.社会分层视域下中国居民体育参与、偏好与层化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2015,51(5):78-93.
- [20] MOTA J, QUEIROS P. Children's behavior, physical activity regarding parents' perception vs. children's activity [J].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1996, 31(2):173-183.
- [21] 王富百慧.家庭资本与教养方式: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家庭阶层差异[J].体育科学,2019,39(3):48-57.
- [22] 尹海立著.传统体育社团的福利功能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0.
- [23] TAKS M, RENSON R, BEUNEN G, et al. Socio-geographic variation in the physical fitness of a cross-sectional sample of Flemish girls 13 to 18 years of age [J].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Biology, 1991, 3(5):503-513.
- [24] SCHEERDER J, TAKS M, VANREUSEL B, et al. Social changes in youth sports participation styles 1969 - 1999: the case of Flanders (Belgium) [J]. Sport, Education and Society, 2005, 10 (3):321-341.
- [25] BIERNAT E, PIATKOWSKA M. Leisure-time physical activity as a compensation for sedentary behaviour of professionally active population [J]. Work, 2018, 60(2): 329-338.
- [26] TUYCKOM C V, SCHEERDER J.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Patterns of Leisure-time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Europeans [J]. Science & Sports, 2010, 25(6):304-311.
- [27] ROSS C E, WU C L. Education, Age, and The Cumulative Advantage in Health [J]. Health & Social Behavior, 1996, 37(1): 104-120.
- [28] ROSS C E, MIROWSKY Y J. The Interaction of Personal and Pa-

- rental Education on Health [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1, 72(4): 591-599.
- [29] 胡安宁. 教育能否让我们更健康——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城乡比较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14(5): 116-130, 206
- [30] 王春光, 赵玉峰, 王玉琪. 当代中国农民社会分层的新动向[J]. 社会学研究, 2018, 33(1): 63-88, 243-244.
- [31] 汪小芹. 中国社会代际流动趋势与结构分解[J]. 经济学动态, 2018(11): 59-73.
- [32] 安妮特·拉鲁(美). 不平等的同年[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28-29.
- [33] 吴愈晓, 王鹏, 杜思佳. 变迁中的中国家庭结构与青少年发展[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2): 98-120, 206-207.

The Trend of Sports Participation Stratific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XU Wei, ZHU Jianyong

(P.E.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ross-sectional data of CGSS2005 and cgss2015, this paper uses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change trend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ports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resid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during 2005-2015, the rate of residents' sports participation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phenomenon of group heterogeneity and level differentiation of sports particip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2) the influence of variables of traditional social stratification on sports participation has been presented diversification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the promotion of individual education level on sports participation is increasing, the influence of professional stratification is still significant, and the promotion of income on sports is weakening; (3)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is weakening, and the role of family education capital is increasing. Therefor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tendency of sports participation group heterogeneity expansion. It is suggested to optimize policies to reduce the imbalance of sports participation caused by structural factors and improve the participation rate of vulnerable groups.

Key words: sports participation; physical exercise; family sports; mass sports; sports social class

(上接第76页)

The Legal Dilemma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the “Salary Restriction Order” in Professional Sports in China

XU Weikang¹, TIAN Siyuan²

(1. School of Juris Master,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9, China; 2. School of Law,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e successive issuance of “salary restriction order” in China's Super League and CBA League indicates that the reform of professional sports in China has moved forward a step further.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alysis,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logical analysi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dilemma of “salary restriction order” in China's professional sports are clarified, so as to provide a richer reference for the better implementation of “salary restriction order”. In the process of formulation, the “salary restriction order” first faces the practical problem of lack of legitimacy, especially the lack of necessary legal basis for the restriction of the labor rights and property rights of athletes, and the lack of supervision, especially the inability to do anything about the supervision of “Yin-Yang contract” and “invisible interests”. In order to play its function, we need to further improve the system design. Specifically, first, we need to repair the legitimacy. There are two main ways to do so. One is to establish the athletes' union and build the collective bargaining system, so that the “salary restriction order” can reflect the contractual agreement. The other is to improve the legislative rank and make up for the normative basis of the “salary restriction order”. Secondly, we should improve the regulatory system, by improving the design of terms, adding clauses of “yearly salary increase” and “anti-circumvention”, and building a regulatory audit system of big data, supplemented by the supervision system of players' salar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Key words: professional sports; players' salary; constitutional right; Yin-Yang contract; trade autonomy